

王承典 主编

淄博文物與考古



写在卷首的话

摆在案头的《淄博文化与风情》、《淄博文物与考古》是淄博文化战线的同志们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宣传改革开放中的淄博，而撰写的。欣逢国庆，权作献给建国四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淄博，地处鲁中，由张店、淄川、博山、临淄、周村五个区和桓台组成，是一座民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交辉的组群式城市。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勤劳智慧的淄博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逐改革开放之大潮，扬进军四化之风帆，团结拼搏，一往无前，1988年已跨入工农业总产值超百亿元城市的行列，成为山东半岛六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淄博，乃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对张店浮山驿大汶口文化和临淄桐林田旺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在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一片物华天宝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文明城市，“五霸之首”的齐国都城，即今日之临淄所在，《战国策·齐策》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的稷下是当时整个华夏的文化中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自鴟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子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孟轲、荀卿都曾在稷下学宫驻足，荀卿曾蝉联三任祭酒，《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诸子书，

很多是产生于斯时。淄博市的其他区、县，也各有一段与临淄齐美的文明史，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淄博，已成为中外友人心驰神往之旅游胜地。

淄博，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先后哺育出晏婴、孙武、左思、贾思勰、房玄龄、贾仲明、王士禛、蒲松龄、赵执信等一大批饮誉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浑如一颗颗闪光的星座，丰富了人类的文明，组成了星汉灿烂的天体。

江山代有精英出，淄博古今人杰多。“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淄博遍地燃起抗日烽火，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黑铁山起义”和英勇悲壮的“马鞍山战斗”。涌现出了马耀南、马天民、马晓云、王凤麟、谭克平、李成式等无数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为了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献力；为了国内外各界朋友加深对淄博的了解，促进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淄博市文化局呼请本系统的同志及社会各界人士，撰写了《淄博文化与风情》、《淄博文物与考古》，以期通过这两本书，使社会对文明千古的淄博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这两本书涉及内容广博，有淄博文化名人的遗闻轶事、古代文化演绎、自然、人文景观、当地风物习俗、传统民间艺术及戏剧、电影、美术、书法的沿革与发展。书中的作品既注重真实性、科学性，也兼顾趣味性、知识性。因此，它可读性强，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当然，欲了然淄博上下几千年的全豹，单凭这两本书，还远远不够，然而，它毕竟对于挖掘、研究、整理淄博文化、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大有裨益，这仍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贡献。

两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关注，以及同志们不懈努力，从1989年5月中旬征稿到7月中旬定稿。在付梓之际，谨向参加编写的同志们、广大的撰稿者和各界人士，表示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征稿范围有限，难免有遗珠之憾，恳请诸家不吝指瑕，以待再版弥补。

王承典

1989·8·1

目 录

序.....	王承典 (1)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淄博市古文化遗址概述.....	张光明 (1)
淄博古窑址与制瓷工艺.....	徐龙国 (9)
齐国与临淄.....	刘忠进 (15)
从孔子闻韶说到齐国乐舞.....	乔荣涛 (30)
齐文化的象征——临淄齐国古墓群.....	刘忠进 (37)
西汉齐王墓.....	王煊文 (45)
泱泱乎，大风也哉	
——淄博出土齐国青铜器掠影.....	于嘉芳 (50)
淄川访古.....	杨海儒 (56)
般阳话旧.....	杨海儒 (76)
乡土的明珠	
——访蒲松龄故居.....	周雁翔 (85)
花无觅处香盈谷	
——青云寺寻古.....	王幼学 (93)
博山古建筑述略.....	刘忠进 (97)
“四世宫保”坊.....	傅荣光 杨占斌 (104)
五贤祠.....	傅荣光 杨占斌 (107)
王士禛纪念馆.....	邱少华 杨占斌 (112)
淄博石刻漫话.....	刘忠进 (117)
周村古商业街散记.....	于崇远 (123)

灿若繁星的流散文物·····	马翔(130)
刘培德起义述略·····	白元廷 王焕文(138)
威震齐鲁的黑铁山起义·····	白元廷 王焕文(143)
马鞍山览胜悼英灵·····	王幼学(153)
周村革命烈士陵园·····	白元廷 王焕文(157)
闪光的足迹 艰难的历程	
淄博革命文物巡礼·····	白元廷(162)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淄博市古文化遗址概述

张光明

众所周知，淄博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灵人杰。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这34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之后又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地下博物馆”之称。开掘研究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利用它们进行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以激发斗志，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起着巨大的特殊作用。

淄博市地处泰沂山脉北缘，南部为山区，北部是山前丘陵和平原地带。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影响，形成南高北低的地势；南部山区多属陆相砂页岩（即石灰岩）地层，而因长期的地质作用形成大小不同的各类岩洞，加之境内河流纵横，山林繁茂，气候适宜，这就为原始人类的活动居住与生存创造了必备的条件。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淄博境内的古文化遗址不仅分布灿若群星，而且很有规律，并内涵丰富，类型齐全。迄今为止在全市境内已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址400余处，其中属原始社会的遗址有103处，奴隶社会时期的遗址120处，封建社会时期的遗址（包括古瓷窑址）180余处。上述古文化遗址，早至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晚至封建社会不同期的旧

居和遗址。而已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多分布在河流沿岸的台梯上，主要分布于孝妇河、淄河、乌河等流域，而南部山区丘陵地带分布较少；至封建社会时期，各类不同朝代和类型的遗址不仅分布面广，而且类型齐全，它不限于河流沿岸、山区平原，而在淄博大地上到处可见，从而证明我们淄博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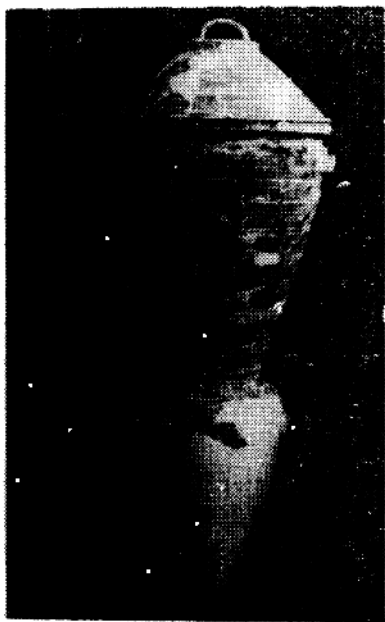
淄博地区迄今还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而在博山南邻的沂源县境内发现了距今约40—50万年的猿人化石，并已被命名为“沂源猿人”。本市南部淄川、博山一带，多山区丘陵，与沂源属一系山脉，岩石岩层的结构形成相同，多属石灰岩岩层，由于受含有二氧化碳的流水溶蚀和沉积作用，形成了大小别异数量较多的溶洞；且境内河流纵横，树木成荫，形成了气候适宜的条件，故淄博境内也应有原始人类的活动居住遗址，这将是今后本市文物考古专题考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1956年我省初次文物普查时，曾在淄川的王母山北峰发现了一处巨石文化遗存，周围还发现了打制石器和赤褐色陶片。据调查遗存是用几块巨大的天然石经人工简单修饰后竖立而成的建筑物，顶盖石长1.84米，宽1.16米，厚0.88米，呈扁平形状，下有高0.70米的3根石柱天然石支撑，形似石冢。这是淄博境内发现最早的巨石文化遗存。据考证巨石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的一种文化，欧洲太平洋沿岸多见此类文化遗存，我国辽东半岛和山东荣成也发现过巨石文化遗存，故王母山发现的巨石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地方文化。

经近年的考古调查，本市境内现存最早的古文化遗址是浮山驿遗址和黄家遗址。属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范畴，距今7000年左右。浮山驿遗址位于张店区傅家乡浮山驿村南的

河流台梯高地上,南面和西面有孝妇河由南向西北方向流过,遗址面积约50000平方米。据钻探知遗址文化堆积厚4米左右,因平整土地遗址上部已挖去1米左右,原地貌已破坏。遗址范围内暴露有大量的夹砂和泥质红褐色陶片以及秦汉时期的瓦片、砖块等,亦暴露有多处灰坑和红烧土等文化遗迹。遗址出土的陶制生活器皿有钵、鼎、壶、罐、盆、圈状器形、座等。陶器纹饰多见北辛文化所特有的指甲纹,附加堆纹、网纹、划纹、三角纹、粗绳纹等装饰,石制生产工具有造型笨拙,制作粗糙的砍伐器和铲、凿、斧等。是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居住村落遗址。

继北辛文化之后的原始社会遗址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均分布在张



店、淄川、临淄境内的淄河、孝妇河沿岸,约计有36处。较典型的有临淄的薛家、崖傅、后李、前李、东古、崔家;淄川区的口头和张店的大寨石佛堂等遗址。如薛家遗址,位于临淄齐故城东南5公里的齐陵镇薛家村西1000米处的淄河东岸,两条东西沟入河口之间,地势较高,文化堆积较厚,面积

约5000平方米。此遗址1964年由北京大学考古队发现，当年并由省考古部门组织了试掘，遗址出土了蚌刀、蚌镰、石镰、骨器和红陶觚、三足灰陶觚、各类鼎足及红陶陶片等。据其出土遗物的特征分析，是一处典型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又如淄川区的口头遗址，1964年，曾在遗址范围内出土了彩绘红陶壶、白陶单耳杯、红陶罐等一批陶器，亦属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地方原始文化，淄博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它不仅集中在淄河、孝妇河流域沿岸，在乌河、范阳河、猪龙河等流域和本市的五区一县均有发现，计有65处之多。典型的遗址有：临淄区的桐林田旺、董褚、于家、大蓬科、苏家、葛家等；张店区有冢子坡、院上、张店公园小学等；淄川区有三台、北沈马；周村区有皇姑顶、水磨东南、鹤子窝、双枣、固玄店等；桓台县有新城、前埠、庞家、郝家等遗址。如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桐林田旺遗址，位于齐故城西北15公里处的路山乡桐林田旺两村之间，乌河东岸的高台梯上，总面积有50余万平方米。经发掘知遗址文化堆积厚达3—4米。1976年和1982年分别由省考古部门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和遗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多见石网坠、石斧、石镰、石铤等；生活器皿有鬲、鼎、盆、碗、杯、豆、鬯、罐等。其中特大型灰陶罍，高1.16米，为同时代国内发现最大的生活器皿，夹砂红陶鬲高38.5厘米，口径30.3厘米，亦为同类型遗址中所少见。从遗址出土的陶器及陶片比例分析，泥质夹砂黑陶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泥质磨光黑陶多见，而蛋壳陶较少见，这是有别于淄河以东和济南地区两城类型龙山文化的主

要文化特征。如此遗址面积大，地理与分布典型，文化堆积厚，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还有董褚、前埠、皇姑顶、三台、北沈马、双枣、水磨和冢子坡等遗址。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当中原地区进入奴隶社会夏朝后，同时期山东地区发现的是岳石文化。淄博地区岳石文化遗址迄今发现的典型遗址不多，仅在唐山遗址、北沈马遗址和皇姑顶遗址有少量遗物出土，如泥质灰陶尊形器，半月形双孔石刀等，而在收集的出土文物中常见此类型的岳石文化遗物。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蓬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是淄博地区原始社会和进入奴隶社会相继居住建国的唯一史载，而淄博地区所发现的奴隶社会遗址主要反映上述所建国的情况。

淄博地区奴隶社会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城址、窑址等分布已较普遍，约有120余处。

本市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遗址、城址、窑址主要有：临淄区的齐国故城、双庙、尧王、西路、西孙、柴家；张店区的南家、大高；淄川区的石谷、公



孙，桓台的句召、史家、华沟；周村区的商家、丁家等。如双庙遗址，位于临淄区敬仲镇双庙村西，文化堆积在2.5米左右，遗址东西长800米，宽250米左右。遗址文化内涵龙山文化遗物较少，多出土商代遗物，如陶鬲、陶罐等，也出土有部分石器，是一处典型的商代晚期遗址。又如句召遗址，位于桓台县田庄镇句召村东北，这里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凸隆高地，高于周围地表3—5米，东西长约900米，南北宽约1200米，遗址到处可见大量的商周及汉代遗物。1987年5月该村因烧砖取土时发现一座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有铜鼎、铜觶、铜铃、铜觚、铜戈等器物；其中铜觶圈足内壁有铭文“龟呼巢”，经考证此铭文为叔龟，是商代奄国之遗物。据西周初年周公东征，灭奄及薄姑，迁奄君于薄姑的史载，可证遗址即迁奄君的薄姑国都城之所在，故遗址的发现为解决薄姑及奄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淄博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后属齐国范围，东汉分设郡州，魏晋始衰，其中心移向青州。由于当时齐国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故封建社会时期的遗址已随处可见，分布更广而密集。其代表性的是城址，淄博地区封建社会有史载和考古调查发现的城市主要有：齐国故城、安平故城、高阳故城、画邑故城、昌国故城、般阳故城、马陵故城、於陵故城、逢陵故城、西安故城、渠邱邑故城、葵邱邑故城、棘邑故城、会城城址等。特别是汉代以后各类遗址数量更多，约计有180余处，而具有地方特色是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古瓷窑址。关于淄博地区发现的古城遗址和古瓷窑址已有专文论述，于此不再赘述。

总括淄博地区的古文化遗址，除有着分布广、数量多、时代早、内涵丰富的特点外，还有着系统的发展序列和特有的文化

特征,是自成体系的考古学类型鲁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原始社会的北辛文化(或称前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发展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季荊氏——蓬伯陵氏——薄姑国——齐国。史载原始社会山东地区是夷人居住活动的区域,故称东夷。东夷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文化,南方地区的苗蛮族文化共同组成我国史前文化的主体,它们的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即汉族文化。夷人是以鸟为图腾的古老民族,史载夷有九种,二十四鸟官(《后汉书·东夷传》,《左传,昭公十七年》)。故东夷已形成一个以鸟为图腾的社会组织,即部落、胞族和氏族,这是我国古代保持图腾制度最完整的记述。而山东地区又是东夷的居住发源地,今山东地区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

据载淄博地区原始社会是爽鸠氏居住活动的区域。爽鸠亦鸟称,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氏以鸟为名的二十四鸟官时,爽鸠为五鸟胞族,是少皞部落的司寇;所以淄博境内发现的上述史前文化遗址有可能就是东夷少皞部落爽鸠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而上述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精制石器和精美的各类陶器,反映东夷居民有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高超的制陶艺术,从而证明东夷文化的先进性和进步性。

而淄博地区发现的大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遗址,是淄博地区高度发达繁荣的奴隶制文化和封建制文化的物质反映。奴隶社会在淄博地区居住并建立的奴隶制国家的季荊氏、蓬伯陵氏、薄姑国,是东夷文化发展到阶级社会后而建立的地方诸侯方国。西周初年,太公姜尚封齐建立齐国,是西方

周人在淄博地区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其物质文化应是周文化和地方土著夷人文化结合而创立的一种新型的地方文化。齐国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策略，利用当地的地利优势，发展工商经济，使齐国成为东方强大的地方国家，成为我国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创造了具有东方沿海开放型文化特点的丰富灿烂的齐文化。淄博境内发现的汉代以前的封建社会文化遗址，正是光辉灿烂的齐文化的具体反映。



淄博古窑址与制瓷工艺

徐龙国

提起淄博，首先给你的印象大概就是它绚丽多彩的陶瓷吧！当你漫步于淄博大地，手之所触，眼之所及，到处都是质地晶莹如玉，釉色如雪似银，造型优美端庄，装饰凝重淡雅，品种丰富齐全的日用陶瓷；形态各异，匠心独具，线条别致，色彩艳丽的美术陶瓷。此外，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特种陶瓷也随处可见。所以，淄博有我国五大瓷都之一的美称。淄博的陶瓷，不仅以其品种多，种类全，风格独特而令世人瞩目，而且还以其历史悠久，工艺水平高超而受到史学家的厚爱。

众所周知，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是我国的“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象征和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可是，你是否知道，制瓷艺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呢？它诞生在“四大发明”之前，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瓷器的前身—白陶。从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在烧制白陶的基础上，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走过了白陶—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的历程，终于烧制出了真正的瓷器—青瓷。从此，制瓷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被世界各国称为“制造瓷器的国家，”“中国”一词为“China”，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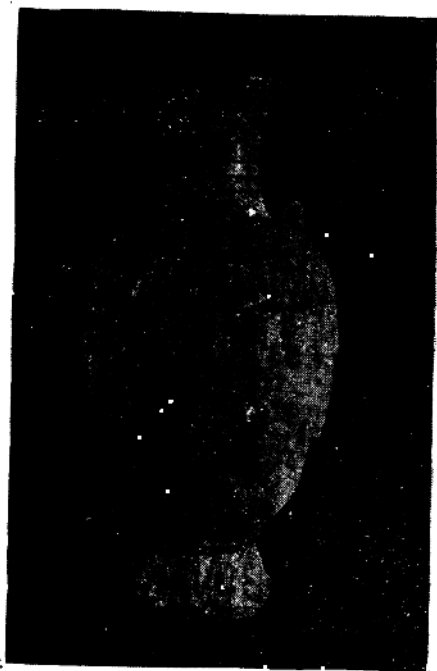
它的另一个词义即是“瓷器”。可见，中国制瓷工艺的发明绝不逊色于“四大发明”。

淄博地处黄河下游，是人类最早生息繁衍的区域之一。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很早以前就开始烧制瓷器。目前，考古调查所发现的10余处古窑址多集中于淄博南部的淄川、博山一带，这里有孝妇河提供充足的水源，有面积广阔的山岭提供森林燃料，地下有丰富的煤炭和烧制瓷器所需要的瓷土。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北朝晚期到明清，这里一直是窑炉遍地，青烟四起。通过对淄川寨里、磁村、坡地、郝家、巩家坞、博山大街、万山、八陡、福山、山头、窑厂等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我们了解淄博地区的烧瓷历史和制瓷工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目前在淄博发现的最早的窑址是北朝晚期东魏和北齐的寨里窑，这也是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两处窑址之一。这是因为，正当中国瓷器日趋成熟之时，北方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则战乱割据，烽烟四起，致使制瓷业停滞不前。该窑址给我们留下的遗物有碗、罐、高足盘、尊等，从这些遗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瓷器烧制具有器类简单，胎制粗糙，釉面斑驳，光洁度较差，制瓷水平不高等特点，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而同一作坊，到了隋代，器物种类有了明显增加，不仅有盛贮器：罐、盘口壶、盆；饮食器：碗、杯、盘、高足盘、钵；而且还有文具：砚、水盂；有生活用具：枕等。同为青釉，但这时的釉色较前一时期纯正，釉面均匀，烧成温度较高，给人以光亮明快，晶莹青翠，澄彻无暇的美感。许多器底还有深绿色、玻璃质感很强的积釉和美妙的天蓝色窑变。这时青瓷已日趋成熟，可以说，北朝时期是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发生阶段；而隋代则是初步发

展时期。

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艺术的繁荣，为淄博地区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窑址



有寨里、磁村两处。瓷器种类以碗、罐、盘等生活用具为主，造型趋于稳重大方，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并有少量黄釉、酱釉。唐代中晚期出现了黑釉，在烧制黑釉瓷器的基础上，又烧制出了雨滴釉，它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其釉面有众多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形似雨滴，给人一种特殊的韵味。

五代北宋时期，淄博地区的制瓷业有较大发展。这时期制瓷区域扩大，窑址增多。磁村、巩家坞、郝家、坡地、大街等是比较重要的几处。瓷器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人物、动物等玩具。白釉瓷器出现于五代，成熟于北宋，是淄博制瓷工艺的一大突破。白瓷“如玉如冰”、沉静素雅，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黑瓷也臻善成熟，达到了“黑如漆，